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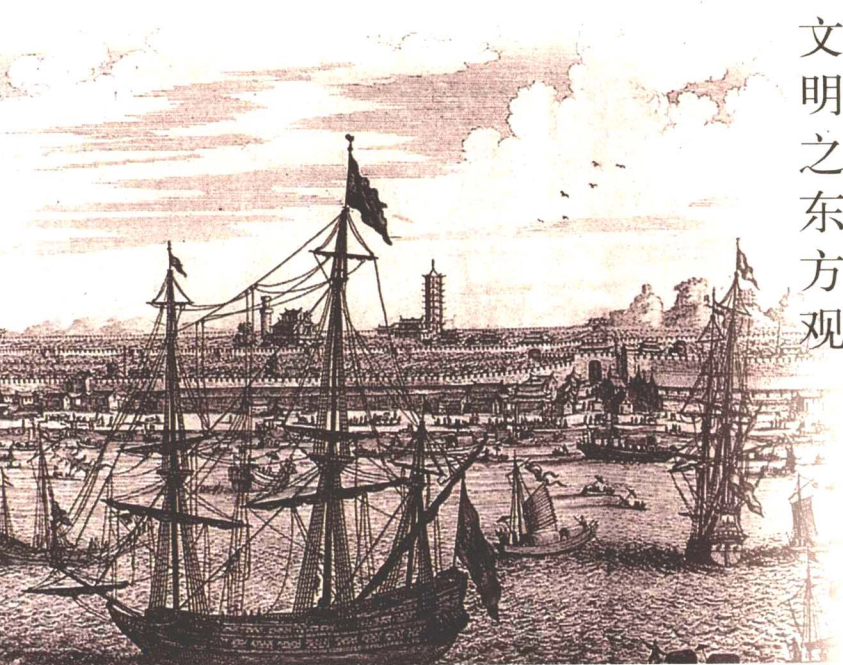


[英] G.L. 狄更生 著
卢彦名 王玉括 译

『中国佬』信札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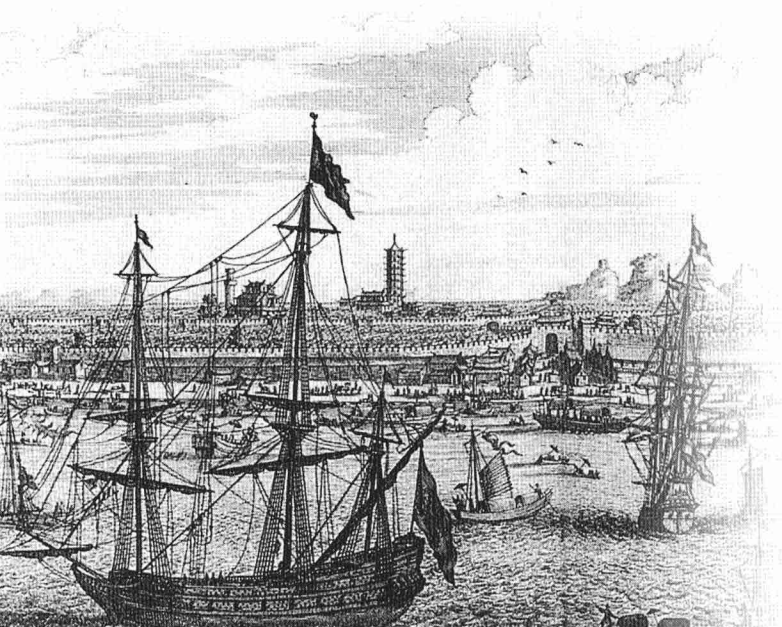
——西方文明之东方观



南京出版社



[英] G.L. 狄更生 著
卢彦名 王玉括 译



『中国佬』信札

——西方文明之东方观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佬”信札:西方文明之东方观/(英)狄更生
(Dickinson, G. L.)著;卢彦明,王玉括译. —南京:南
京出版社,2008.4

(“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书名原文:Lettrs from John Chinaman

ISBN 978-7-80718-377-8

I. 中… II. ①狄… ②卢… ③王… III. 东西文化—比较
文化—研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890 号

丛 书 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书 名:“中国佬”信札——西方文明之东方观

作 者:G. L. 狄更生

主 编:张子清

译 者:卢彦明,王玉括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17(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赵育春

装帧设计:郭春明

印 刷: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965×1270 毫米 1/32

印 张:5.25

字 数:137.8 千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8-377-8

定 价:15.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出版者的话

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众多来华的西方作家中,我们选取了一些作品,结集而成这套“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他们之中有西方报刊派驻中国的记者,有著名的汉学家,还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交官,或清廷所雇用的外国官员、教习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他们基本上以比较客观的笔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等方面作出了写实的描绘。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衰败,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更多地表现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而这些著述恰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民族的自我认识。

不可避免的是,在那些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录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基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些西方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认识有其真实的一面,但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在主观上不可能不受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所记所述依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忠实地保留了原样,其宗旨是为了展现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我们相信,阅读这类图书的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水平对事实加以针对性地鉴别和分析。

译者序

尽管早在 13 世纪中后期，西方就出版了把中国描述为富庶、神秘国度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而且 17 世纪的前 20 年西方出现过赞扬中国的第一个高潮，认为中国政治开明、文化先进，值得效仿。但是 18 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中积极、开明的中国形象逐渐走向负面，甚至反面，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国内有识之士担心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虽然随着通商口岸的设立，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得以大量涌入，在与中国人的近距离接触中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及其民族特性的作品，并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当时国内读书界对这些作品的了解与介绍较少。残酷的现实以及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感使得国内的知识界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如坚船利炮等更为欣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大致确定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翻译与接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民国初期很有市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在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时有时会得出如鲁迅先生那种比较极端的结论：“我认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0 世纪前 20 年，中国知识界对中西文化所持的态度及其社会氛围也可以从来访的国外著名学者，如杜威、罗素、泰戈尔等人在中国的

受欢迎程度得到体现，而泰戈尔先生的黯然离去更是中国知识界反思东方文化的极端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以及政治方面民主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走向多元，大国心态的逐步确立也使得国人能够有充分的自信面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与描述。因此，为揽他人之镜以自照，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描述中国文化特性，反映中国文化与习俗的一些作品。这些译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的西方作品，大多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有的作品明显体现出作者的白人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文化偏见，把中国人视为需要拯救的异教徒等等，曾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反感，也曾经激发国人奋发图强、赶超西方的决心。

与同时代的西方人相比，本书作者狄更生是个比较罕见的例外。1862年他出生于伦敦；1882年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研究希腊罗马史；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86年，他在父亲的资助下，又在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医学硕士学位，但最终决定放弃医学工作。1887年，他以一篇关于普罗提诺的学术论文被选为国王学院研究员。1896年，他的《希腊人的生活观》出版之后，狄更生作为历史学家成为国王学院终身研究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虽然那时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却能根据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中国文学瑰宝》以及曾任法国驻华领事的西蒙的《中国城市》等著作，从虚拟的中国人的角度，撰写《“中国佬”信札》，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跟你们谈论中国，并非我对这个话题所知甚多，亦非我曾经到过那个国家，而是因为也许我上辈子是个‘中国佬’。”由于对中国文化怀有天生的亲近，他笔下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面纱。不知与他同时代的英语读者对此作何感想，但笔者认为，即便是与他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如果他们不仅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演变，而且能够坦然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西方

强势文化的“入侵”——恐怕也对他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不无保留：中国的儒家学说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人们永久的精神支柱？中国的政体是否已经理性、开明到狄更生所希望的那样？中国读者不禁要问，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否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幻想？他勾勒的中国形象是否过于理想化？如果他有机会面对当代活生生的中国，又将作何感想？

然而，十分有趣的是，1913年，狄更生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并没有对中国当时的政局以及中国文化感到失望，他在广东会晤孙中山先生之后北上，到曲阜访问了孔子第76代衍圣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让人愉快、友好、美丽、明智、希腊式的、优秀的、人性的民族”。他在后来写给英国作家福斯特的信中说：“中国正是我想象的模样。”“中华民族非常自尊、礼貌和友善，总是谢绝做任何他们认为不理智的事情。”

不仅作者的《“中国佬”信札》对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推崇备至，而且其《论印度、中国与日本文明》，也通过所见所感，比较准确地刻画了印度、中国与日本这三个东方国家各自的文化特点，认为“印度的主要标志是宗教；中国的主要标志是人文；日本的主要标志是武士精神”。并指出，“在我的印度之行中，没有什么比大自然的支配力以及人的无能与渺小给我留下的印象更生动了”。他发现，印度的哲学和宗教自始至终认为人可以通过冥想和戒律打开内在的感知，即对真理的感知。他对日本文化也有独到的发现，认为“日本是我走访过的国家中唯一使我想起我心目中古希腊样子的国家”。“日本给人的印象是，日本人‘率直、感性、充满激情’，易笑、易争吵、易杀戮，做任何事都激烈而鲁莽。我想，你在他们身上找到的与希腊人的相似性绝不是肤浅的。日本人的性格和造诣不如希腊人的方面在于他们相对而言缺乏理性。”狄更生《面貌：东西方游记》一书中，通过具体的区域描写，比较客观地指出东方文化与文明的可爱之处。

狄更生不仅关注东西文化与文明，也是一位关注世界和平的学

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周内，他参与起草了“国际联盟”的方案，该方案成为战后国际联盟成立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狄更生还写了大量著作和小册子宣传其国际和平主义思想。1916年，他到美国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国际联盟理念，希冀消除纷争，推进世界和平。

面对这么一位钟情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我们恐怕很难因为他作品中的些许乌托邦色彩而否定其文化价值，其客观上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行的批判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文化财富，不仅为我们反思西方的“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话语提供了参照，而且也为我们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昭示了诱人的前景。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十分敬重他，曾以诗相赠。李欧梵教授指出：“狄更生和徐志摩的智能发展过程竟然出奇的相像，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却正好相反。”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时间之流的冲洗，狄更生先生关于中国以及东方文化的理想不仅没有碎化成美丽的泡沫，在纷杂、拥挤的世界中干枯、消失，而且在21世纪的全球化大潮中再次成为耀眼的浪花，引人驻足。译罢本书，我们不得不反思鲁迅先生的“诅咒”：“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事异时移，对鲁迅先生的愤激之言，我们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位深受辜鸿铭老先生赞许的英国学者的东方情怀，只有恳请读者诸君明鉴。

是为序。

2008年3月29日

「中国佬」信札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西方文明之东方观

美国版简介

在斗胆把下列书信呈现给美国公众之前，我总觉得人们或许会期待我在前言中即便不向读者道歉，也会做些许解释。因为这些东西本来是英国人而写，主要涉及英国的制度，当然，信中也偶尔提及一些当代历史与政治方面的话题——当然，欧洲读者比美国读者对此更感兴趣。有鉴于此，在美国出版这些书信可能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些造次。但是我斗胆地想，如果它们对欧洲读者有什么意义，那么它们可能同样会对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时事问题有兴趣，而是着迷于对东方与西方理想的整体对比。而美国，无疑是西方的杰出代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以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把欧洲最勇敢、最专业以及实际上最聪颖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但是，她也因此把敏感者、沉思者以及虔诚之人排斥在外。她的存在本身已经无意识地筛选了不同民族，上帝的子民已经从她命运的铁网中溜走，而她收进谷仓的只是些世俗的孩子。她也因此独具一格地成为西方世界的象征与榜样。在她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工业天才尽显其才：毫无阻隔地逶迤绵延、赤裸裸地，没有一丝羞涩。而在欧洲，工业仍然需要争取这种霸权；因为它仍然需要面对过去阶段的社会残骸，面对有碍于它成功，不理解它目的的各种理想、各种习惯、各种制度、各种不朽的典范与各种传统。北方的各种大教堂，呈灰色，像悬崖般崇高壮观，耸入云霄，而南方的各种大教堂，其颜色与形状则像它们装饰的风景画一样可爱、华丽非凡。它们证明，不管它们有什么缺陷，其宗教旅程至少都在精神方面有无所畏惧之处。辉煌的宫殿、庄园、公园、古老的爬满青苔的农舍，使得悠久、世袭与稳定的传统等级秩序得以永存。头衔、行为、举止、整套的生活仪式，显示出一

种准则与责任标准,尽管也在开始消失,但还没有转换成金钱关系。那种认为悠闲可能很高贵,行动可能很卑下;既有内在生活,也有外在生活,而外在生活无论怎么衡量,都只有服务内在生活时才有价值,这样的观念依然存在,而且在个人生活中非常有效,并体现于文学与艺术作品中。总之,在欧洲,现代精神仍然需要对付古代文化,其方法与结果也被这种矛盾修正与改变。但在美国,它是自由的,无论我对其特征及其运作的分析多么有道理,人们都期望在更大范围内,在更加大胆、更加强硬的状态下,在这个大陆而不是欧洲的任何国家予以阐明。无论是否如此,我都一定把它留给我直率的美国读者来判断。但是,若果真如此,我将不得不想,它不仅对美国的未来,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因为读者不可能认识不到欧洲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美利坚合众国发展过程中的危险也关系到西方文明的成败。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不受过去美丽壮观废墟的妨碍——无论旧世界的废墟多么伟大,它都会带着恐惧、犹豫与后悔,妨碍人们艰难地驶向未来的福地。美国被赋予了智慧、能量与力量,结合了青春期的伟大热情与成熟期的谨慎,对自己的使命几乎怀着宗教般的信心,在这种信心的激励下,美国人民仿佛得到神启,要以极其卓越的方式决定未来社会可能会实行的形式。他们维系着西方世界的命运。如果我是美国公民,坦率地说,我与其说是兴高采烈,倒不如说充满了焦虑,并进行严肃的反思。我要反问自己,我的同胞在物质与空间方面取得的胜利是否以牺牲精神方面的洞见与力量为代价;他们在实用艺术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否伴随着对科学、文学与艺术的任何重要贡献。换句话说,灵魂是否与身体一起生长,或灵魂趋向于萎缩、腐朽。回顾人类的悠久历史,思索相继孕育了文明火炬的许多民族的记录——英国现在正把文明的火炬传递给美利坚——再思索所有在欧洲消失以及还没有开始展现自己的民族,我觉得人类正处于分界点上,而且或许正面临着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无与伦比的严肃、重要的问

题。我把这个问题陈述为：是它创造了宗教、艺术及其对过去的思辨；经过圣礼般的神迹，这种对永恒的无休止的渴望，已经变质为理想的神圣本质，变质为实际生活的基础与普通因素；不可遏制的渴望，不知疲倦地寻求体现的方式，已经假设了许多非常诱人、非常可怕、非常神圣的形式，这种渴望已经茁壮成长于印度神话的丛林中，盛开于希腊的万神殿，受难于十字架，消亡于火刑柱，消耗于修道院与隐修处，这种渴望已经赋予大理石以生命，赋予色彩以物质，赋予飘逝的声音以结构，赋予火与云的宫殿承载其欲望，而且因其美丽，使其比钢铁王国和黄金王国更加真实。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这种渴望是否会追踪我们，使我们心力交瘁，精疲力竭？这种精神能否推动我们命运的车轮勉力前行？或者说，我们能否用舒适、安全、和平的空壳填饱我们的皮囊？挤压在优雅的御者所驾驶的诃里什那神车^①下面的尘埃里？我们要成为精灵还是要成为聪明的野兽？我们要成为人还是只想成为机器？现在提到西方民族面前的这个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已非常显眼地摆在这些国家的人民面前。如果我是美国人，那么我肯定不会怀疑自己的同胞有能力予以回答，而且能够以最好的、最富有成效的方式予以回答。但是，我想，由于意识到这种问题的浩瀚无际，一旦有要沉湎于不合时宜的狂喜苗头，这种意识就会阻止它进一步蔓延、扩散。因为我觉得，这种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连基础都没有奠定，啥也没有，甚至连建设计划的草图都没有画出。举目四望，越过大洋，把目光投向欧洲与远东，我感到焦虑，根本不是去模仿形式，而是挪用那个旧世界的灵感——它创造了礼貌、法律、宗教、艺术，其历史不仅仅是身体的记录，而且也是人们灵魂的记录；其精神已经越出它部分体现于其中的形式，现在正盘旋在你的门前，要求一种新的、更加

① 传说诃里什那为毗瑟拏（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之神）的化身，每年例节用车载此神像游行，迷信者相传若能被该车辗死即可升天，所以甘愿为该车辗死的善男信女极多。——译者注

完美的化身。你将来不会接受它吗？我丝毫不怀疑你会接受，如果今天不能接受，那么可能是明天，如果不是明天，那么可能是后天。倘若我这些不完美的书信以最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于在你们读者当中培养一种对此的欢迎态度：承认其目的很真诚，你们可能会原谅它们的缺陷，而且会容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哪怕说者是一个陌生人，否则，你们可能会自然地对此胡言乱语很反感。

第一版前言

本书的前四封信已经在《周末评论》上刊载过，现在获得原杂志编辑的允许在此重新刊出，其余的书信均为首次出版。

第一封信

中国近来的时局使得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根本对立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相互间的鄙视,以及相互之间的不了解是造成当前这种对立状况的主要原因。面对当前的这种悲剧,我一直沉默不言。但是,由于越来越感到愤慨,当然,也越来越感到希望与日俱增——这些可能都只是一种幻觉——我觉得自己或许能够消除某些误解。这种想法促使我最终打破沉默,在英国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早就渴望表达的观点。我并不想对眼下的危机说三道四,我的目的是促成对我国同胞以及他们的政策有更加公正的评价,并尽我所能,解释我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以及我们竭力排斥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我认为自己并非完全不胜任这项任务:长期居住在伦敦,使我能够评点你们的制度,而远离自己的祖国并不妨碍我评点自己的文明。“中国佬”就是“中国佬”,尽管我在某些方面非常钦佩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还没有看出自己作为出生于东方的公民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对英国人来说,我的这种自白好像有点奇怪,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当成野蛮人,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也只有在我们偶尔谋杀你们同胞的情况下,你们的注意力才会强烈地关注我们。由于这种事件是间歇性地,所以你们自然会匆匆忙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一个冷血的、谋杀的民族,就像我们根据你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得出关于西方文明的笼统看法一样。你们不能根据我们中的草莽之人的某些行为来判断我们,我甚至还想补充说,你们也不能根据我们政府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因为中国的政府并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然而,我冒昧地想,那些残暴行为——中国所有知书达礼之人也都对此予以强烈地谴责——对欧洲人来说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而非如你们迄今所做的那样,非常克制地斥责。因为这种感情表达是我们在东西关系方面的——而且

一定总是如此——最有力的因素，我们对你们文明极端的不信任与厌恶。你们自然把这种情感归结于偏见与无知，但是我冒昧地认为，实际上，它基于理性。因此，我想请我的读者严肃、耐心地考虑这种观点。

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最好的文明，当然我得说，这也并不等于说它是最糟糕的文明。恰恰相反，这种古老悠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能保证我们处于稳定状态，而这种稳定我们无法从欧洲民族中找到。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文明不仅悠久，而且体现了一种道德秩序；而在你们的文明中，我们只能发现经济混乱。你们的宗教是否比我们的好，我现在不想与你们争辩；但是可以肯定，它对你们社会的影响要微弱得多。你们宣称信仰基督教，但是你们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我们则是彻头彻尾的儒家文明。但是当我们说它是儒家文明时，我们是说它是道德文明，或者至少说（因为我不想回避问题的实质），它关注的主要是那种道德关系。而（我们认为）对你们来说，经济关系则是第一位的；你们也竭力赋予它们更多的道德因素。

我将通过对比你我之间对家庭的看法这一点来阐释我们的文明。对你们外国人来说，家庭只是一种抚养、保护孩童长大成人，直到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你们尽早把男孩送到寄宿学校，他们也很快从自己家庭的影响中解脱出来。他们刚成年，你们就把他们送走，并说什么，让他们“去闯世界”。从那时起，他们经常不再依赖父母，因此也就不再承认对父母的责任。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挣钱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保持与家庭的联系。对你们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单位，而所有单位都是自由的。所有人都不受拘束，因此所有人也都处于无根状态。用你们自己的话说，你们的社会是“进步的”，你们总是“勇往直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必然）替自己闯出一条新路。你们会认为待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是一种耻辱；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

去冒险、斗争、竞争、取得成功。你们的社会无疑被赋予了这种特性：衡量一种行为是否优秀，是看它在所有物质艺术上是否成功。但是这也正是让“中国佬”震惊的一种特征——动荡不安、混乱不堪与缺乏（我们认可的）道德。在你们当中，没有人感到满意，大家也都没有闲暇享受生活，都打定主意要增加生活资料。借用你们自己作家的一个短语，“金钱关系”是你们彼此承认的唯一关系。

而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这恰恰是野蛮社会的标志。我们衡量文明程度不是根据其积累的生活资料，而是根据其生活的价值与伦理。倘若没有人道的、稳定的关系，不崇敬过去，甚至不尊重现在，而仅仅贪婪地攫取未来，那么，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如果我们必须以模仿你们的体制为代价，那么我们肯定能够在财富、科学与艺术方面与你们一较长短。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自己的步骤跟你们的都正好相反，我们首先关注社会，然后再关注个人。我们中间有条规则，每个人都出生于某些特定关系之中，而他也将在未来的生活中予以继续。他生是某个家庭的人，死也是某个家庭的鬼；他的整个生活理论与实践都服从于这种状况。人们教育他要崇拜祖先，尊重并服从自己的父母，很早就开始准备承担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婚姻不能打散这个家庭，若是丈夫，他就自然地待在这个家里，若是妻子，她则成为男性亲戚团体中的一员。这种亲戚团体是社会单位，有其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祭坛与共同的礼仪，有其在团体成员之间解决纷争的共同的裁决。除非是自己犯了错误，中国没有人是孤立的。如果他不像你们那样容易发财致富，他们也不会轻易挨饿；如果说他没有竞争的动力，那么他也同样没有欺骗与压迫别人的诱惑。他不受虚荣的折磨，也不用担心穷困潦倒，因此，他有闲暇不必为了生计，忙着获取生活资料。他既有这种本能，也有这种机会欣赏自然，培养良好的风度，与同胞们保持一种人道的、无利害冲突的关系。其结果只能是这样——我们视其为无论在道德还是在美学方面都比你们欧洲的大多数公民更加优越。当然，我们